

# 基于数据驱动的政治话语翻译研究

——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本为例

姜坤

曲阜师范大学 翻译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26

**摘要:**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本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高频词分析、对应分析、多维尺度分析等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从语言、文化和政治三个维度系统考察中韩政治话语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及其效果,发现:中韩政治话语在语言表达、文化内涵、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文原文更强调概念凝练性、集体主义倾向,而韩文译文则更加注重语言灵活性、个人主义色彩;尽管存在诸多分歧,中韩政治话语在“发展”“合作”“和平”等核心概念的表达上仍呈现出一定的共性,这为两国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价值观认同奠定了基础;译者采取了词汇选择、句法重构、增译补释等灵活的翻译策略,力图在忠实原文和迎合译文读者之间寻求平衡,在中韩语言文化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关键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政治话语;跨文化传播;数据驱动

**中图分类号:**H059;G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4.04.011

**文章编号:**2096-9864(2024)04-0087-10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强,意识形态和文化竞争日趋激烈。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跨文化政治话语传播已成为塑造国际形象、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手段。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亟须加强政治话语的跨文化传播,向世界阐明中国的发展道路、治国理念和政策主张,提升负责任大国形象,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与支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丛书集中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是国际社会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系统研究这一重要文献的跨文化传播,对于提升中国国家话语权、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战略意义<sup>[1]</sup>。

随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出版发行,该书的翻译版本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已有研究根据不同的主题大概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聚焦翻译策略,探讨英译本中典故、语法标记、文化词等的翻译方法及其对外宣翻译的启示<sup>[2-3]</sup>。这类研究揭示,译本在力求忠实原文的同时,也在适度调整语言形式以适应目标读者,体现了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间的动态平衡。第二类是关注传播效果,分析该书在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道路方面的贡献及其“走出去”策略<sup>[4-5]</sup>。这类研究突出强调,译本传播的结果取决于内容、形式、渠道等多种因素,需要统筹兼顾。第三类是探讨翻译与国家形象塑

收稿日期:2024-04-2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1YJC740021)

作者简介:姜坤(1981—),女,山东省济南市人,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话语翻译与传播。

造的关系,考察翻译在构建和传播国家形象中的作用与实践路径<sup>[6-7]</sup>。这类研究表明,政治话语翻译是国家形象海外投射和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以上成果拓展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翻译研究的跨文化视野,彰显了翻译的政治属性,但仍存在不足:在研究对象上,对韩译本关注不足;在研究方法上,定量分析运用有限;在研究内容上,对翻译过程和动因剖析不够。鉴于此,本文拟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本为例,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聚焦中韩翻译,综合运用定性定量分析,深入考察翻译过程和传播效果,以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国际传播。

## 一、研究方法

本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一个专题的中文原文和韩文译文为研究语料,采用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对目标语料进行系统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不依赖于预设的理论模型或假设,而是根据数据本身的特征和规律,运用合适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发现并阐释数据中蕴含的信息和知识。这种分析范式是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推动翻译研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sup>[8]</sup>。

具体而言,本文综合运用高频词分析、对应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三种数据分析方法,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一个专题的中文原文和韩文译文进行深入、细致的对比分析。高频词分析法通过词频统计和关键词提取,揭示语料的核心话题<sup>[9]247-269</sup>,可据此考察中韩文版本词汇使用的异同及其反映的文化差异;对应分析法主要用于揭示变量间的对应关系<sup>[10]</sup>,可据此考察中韩文版本关键词搭配模式和语义连接的差异;多维尺度分析法通过对多维数据的压缩和降维,揭示其内在结构<sup>[11]</sup>,可据此对中韩文版本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考察其在语义空间上的分布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种数据分析方法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的。高频词分析法提供语料整体特征,对应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揭示内部结构和深层关系。通过数据驱动的多维分析,本文力图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全面考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本的翻译特点和传播效果,为揭示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跨文化传播规律提供实证依据。

## 二、数据分析与讨论

### 1. 高频词分析

高频词分析是语料库研究中常用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对语料进行分词、词频统计和关键词提取,能够揭示语料的核心话题和关键概念,并对不同语言版本的异同进行初步考察<sup>[9]</sup>。本文利用高频词分析法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一个专题的中文原文和韩文译文进行预处理,提取出各个文本的前30个高频词(见表1),发现其核心概念和主题,以此考察中韩文版本在词汇使用上的共性与差异,并对其中反映的文化差异进行分析。

为了更准确、更全面地分析中韩文版本高频词的差异,本文将中韩文词频表中语义对应的词汇挑选出来并进行卡方检验。之所以选择卡方检验,是因为卡方检验专为类别数据设计,用于比较不同群组中类别变量的分布差异。在语言学研究中,词频通常被视为类别数据,即每个词作为一个类别,其频次表明了该词在文本中出现的次数。因此,卡方检验是语料库语言学中最常用的统计检验方法,特别适用于研究语料库之间的语言变异<sup>[12]</sup>。同时,卡方检验是一种非参数检验,不需要对数据分布做正态分布的假设。这一点对于词频数据尤为重要,因为词频数据往往不符合正态分布,可能是偏态分布或多模分布。此外,卡方检验可以用来检验两组数据之间的独立性。在比较中文和韩文

表1 中文原文和韩文译本的高频词(前30位)

排序	中文词汇	词性	词频	韩文词汇	词性	词频
1	中国	proper noun	148	인민	noun	161
2	人民	noun	146	중국	proper noun	144
3	党	noun	145	사회주의	noun	127
4	社会主义	noun	121	발전	noun	92
5	特色	noun	102	특색	noun	91
6	要	verb	91	당	noun	63
7	坚持	verb	83	견지	noun	52
8	群众	noun	63	건설	noun	50
9	建设	noun	56	새롭다	adj	49
10	社会	noun	53	기본	noun	47
11	发展	noun	49	위하다	verb	45
12	历史	noun	48	역사	noun	44
13	发展	verb	44	노선	noun	41
14	就	adv	43	사회	noun	39
15	新	JJ	38	대중	noun	38
16	主义	noun	37	되다	verb	36
17	大	JJ	37	제도	noun	35
18	制度	noun	35	민족	noun	32
19	基本	JJ	35	실천	noun	32
20	不	adv	34	당대회	noun	30
21	都	adv	32	이론	noun	28
22	理论	noun	29	하다	verb	28
23	必须	verb	28	개혁	noun	27
24	实践	noun	27	요구	noun	27
25	改革	noun	27	국가	noun	24
26	工作	noun	26	당원	noun	23
27	民族	noun	26	정치	noun	23
28	能	verb	26	군중	noun	22
29	领导	noun	26	전면	noun	22
30	不断	adv	24	대하다	verb	21

表2 中韩文版本语义对应高频词卡方检验结果

词汇(中/韩)	中文版词频	韩文版词频	卡方值	P值
中国/중국	148	144	0.055	0.815
人民/인민	146	161	0.735	0.391
党/당	145	63	31.538	<0.001
社会主义/사회주의	121	127	0.121	0.728
特色/특색	102	91	0.617	0.432
群众/군중	63	22	21.306	<0.001
建设/건설	56	50	0.340	0.560
社会/사회	53	39	2.130	0.144
发展/발전	93	92	0.005	0.942
历史/역사	48	44	0.174	0.676
制度/제도	35	35	0.000	1.000
理论/이론	29	28	0.018	0.895
实践/실천	27	32	0.424	0.515
改革/개혁	27	27	0.000	1.000
民族/민족	26	32	0.621	0.431

的核心词汇,且在语义指向上高度对等,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能够比较容易地找到对应的表达,进而实现较高的翻译忠实度。考虑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外宣属性,韩文译本在翻译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核心政治概念时,可能有意采取了更加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策略,力求准确、完整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以期增进韩国读者对中国国情和政策主张的了解。这种翻译策略的选择,体现了译者对政治话语跨文化传播的慎重态度和对忠实原则的坚守。这些词汇所指称的政治理念,如国家利益、人民福祉、发展诉求等,虽然在不同国家和语境下可能有不同的具体内涵,但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话语资源,它们为跨文化政治交流提供了共同的语义基础。从跨文化翻译的角度看,这为两种语言在政治话语传播中实现“文化移植”提供了有利条件<sup>[14]</sup>。

在分歧方面,在“党”“群众”等政党建设和群众工作相关概念上,中韩两国表现出了明显分歧( $P < 0.001$ )。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韩国译者有意淡

的高频词时,卡方检验能够评估这些高频词在两种语言中的使用是否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sup>[13]</sup>。中韩文版本语义对应高频词卡方检验结果见表2。通过对中韩文版本高频词进行卡方检验,我们发现中韩两国在政治话语的核心概念上存在着明显的共性与分歧并存的状态。

在共性方面,在诸如“中国”“人民”“社会主义”等一些核心概念的表达上,两种语言的词频极为接近,差异不明显( $P > 0.05$ )。这种共性的呈现,与韩文译本对中文原文较高的翻译忠实度密切相关。从跨语言对比的角度看,上述政治概念在中韩两种语言中都是高频使用

化这些在韩语语境下可能引发误读的表达。从跨文化翻译理论看,这属于译者出于跨文化交流的考量对原文进行的“文化改写”<sup>[15]</sup>。从政治话语分析理论角度看,也展示了译者在翻译中所秉持的话语策略和权力关系的转移。

通过以上的高频词分析和卡方检验结果,我们发现中韩两国在政治话语的核心概念使用上存在明显的异同。这种异同体现在翻译策略、文化差异、概念理解等多个层面。

首先,在翻译策略上,中韩文版本呈现出明显的静态和动态之分。中文原文倾向于使用名词性词组表达抽象概念,如“科学发展”(频次93)、“小康社会建设”(频次56)等。这些词组在原文中通常强调一种抽象的、总结性的概念,突出稳定的特点。而在韩文译文中,相应概念多被动词化,如常使用“发展”(频次92)、“建设”(频次50)等词语强调一种动态、过程性的特点。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中韩语言在语法和表达习惯上的差异,但更深层次地体现了两种语言所承载的思维方式差异。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汉语更强调整体性和静态性,而韩语更强调个体性和动态性<sup>[16-17]</sup>。因此,在政治话语翻译中,译者需要充分考虑两种语言在表达模式上的差异,在忠实原文内容的同时,也要适当调整语言形式,以更好地适应目的语读者的接受习惯。

其次,中韩政治话语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从高频词表中可以看出,“人民”一词在中韩文版本中都有很高的出现频率,分别为146次和161次。这反映了中韩两国政治话语都高度重视人民的利益和地位,体现了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然而,在个人主义倾向上,中韩两国则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例如,中文版中“群众”一词的频次(63)明显高于韩文版中的频次(22),且常与“党”(频次145)一词共同

出现,如“依靠群众”“党群关系”等,突出强调了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集体力量。而韩文版则对个别政治人物的提及更多,如“毛泽东”(频次8)、“邓小平”(频次6)等,体现了一种个人主义色彩;“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也有提及,更强调了个人的作用和影响。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中韩两国在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中国,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一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话语。而在韩国,个人主义受到更多推崇,这也影响了韩国的政治话语表达。因此,在跨文化政治话语传播中,必须充分认识和尊重这种文化差异,在翻译策略上采取灵活的应对方式,才能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流。

再次,通过分析中韩政治话语在时空概念使用上的相似性,也可以看出两国在政治思维和表达方式上的一些共性。无论是中文版还是韩文版,都频繁使用了“过去”(中文频次6;韩文频次4)、“现在”(中文频次13;韩文频次10)、“未来”(中文频次8;韩文频次5)等时间名词,以及“中国”(中文频次148;韩文频次144)等专有名词。例如,中韩文版本中的“总结过去,立足现在,着眼未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等,都反映了中韩两国在政治决策中高度重视对时空环境的考量,强调制定政策要立足现实,放眼未来,这体现了一种务实理性的思维方式,也是东方政治文化的一个共同特点。这种政治话语上的相似性,为中韩两国在政治领域的交流合作提供了文化基础。在政治话语的跨文化传播中,应充分利用这种语言和文化上的共性,采用直译等翻译策略,以增进两国民众对彼此政治主张的理解和认同。

总之,高频词分析揭示了中韩政治话语在语言表达、文化价值、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异同。这种异同构成了跨文化政治话语传播的重要语境,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效果的预判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只有在充分理解两种语言政治话语特点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才能有效地实现政治理念的跨文化传播,增进中韩两国的政治互信与合作。

## 2. 多维尺度分析

多维尺度分析是一种探索高维数据内部结构的统计方法。通过对多维数据进行压缩和降维,能够将实体间的多元距离投影到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最佳拟合的低维配置中,从而揭示数据的内在关联和聚类情况,并以直观的空间图像呈现出来<sup>[11]</sup>。多维尺度分析有助于我们直观评估和理解多元数据在低维空间的分布特征,通过降低数据的维度,可以观察到数据中的模式、梯度和聚类,这对探索性数据分析很有帮助。本研究利用 KH coder 的多维尺度分析功

能,对中文源文本和韩文译文本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考察两个版本在语义空间上的分布特征,并结合定性分析,揭示其反映的文化语境差异。中韩文高频词在三维语义空间中的分布情况见图1和图2。

通过对比分析中韩文版本高频词的 MDS 图像,我们发现两个版本在语义空间上呈现出一些共性与差异。

维度1反映了两种语言在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倾向上的差异。如图所示,在维度1上,中文原文的高频词更倾向于正向,而韩文译文更倾向于负向。进一步分析发现,位于中文版本维度1正向的高频词多与集体主义相关,如“人民”“党”“国家”等;而位于韩文版本维度1负向的高频词则多与个人主义相关,如“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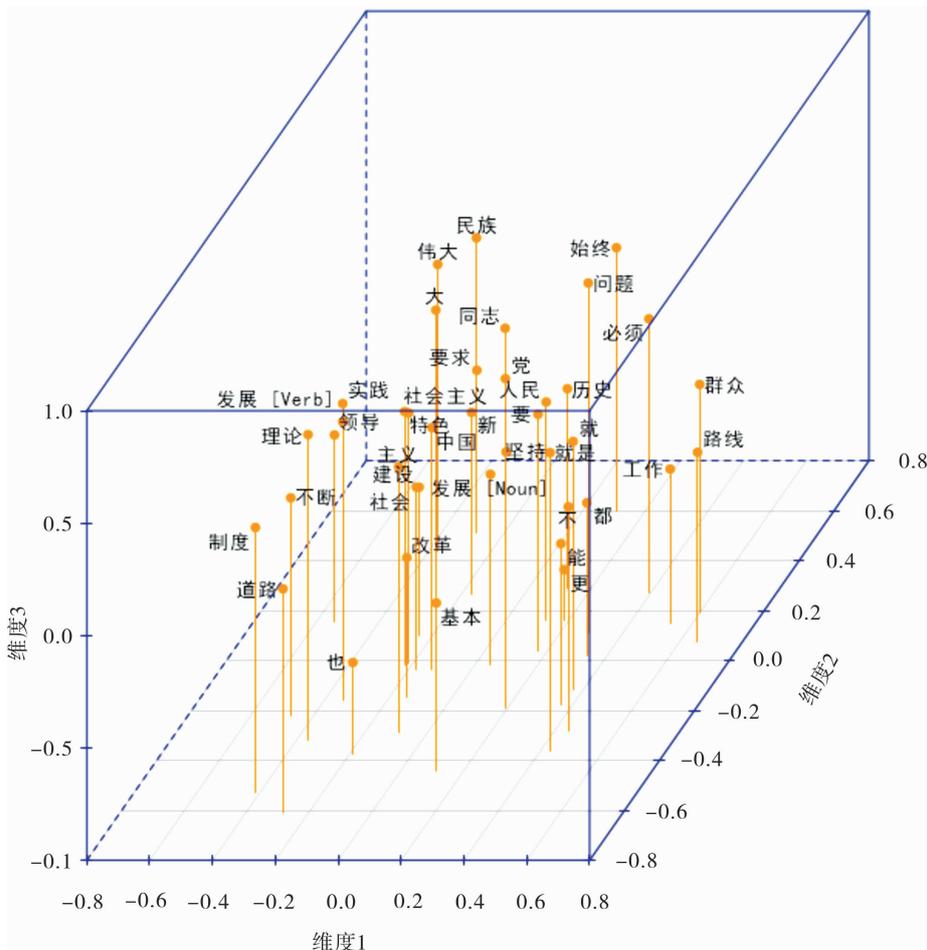


图1 中文源文本多维尺度数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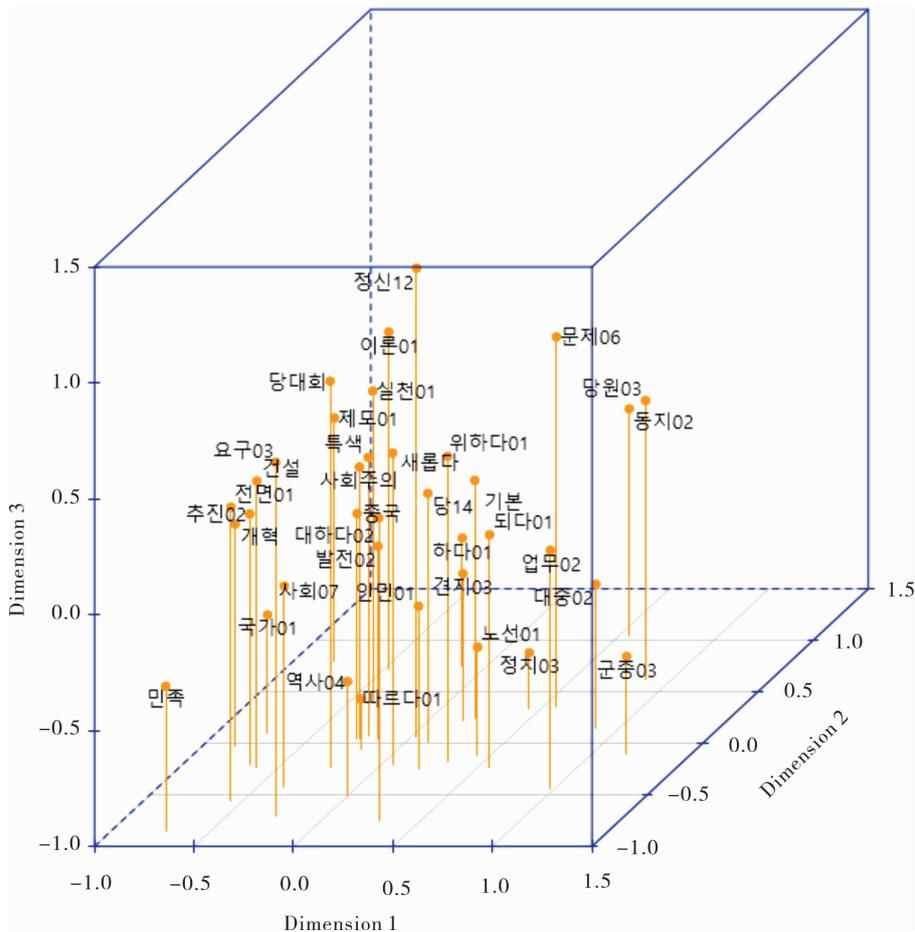


图2 韩文译文本多维尺度数据图

“领导力”“领导人”等。这一结果与我们在高频词分析中发现的中韩政治话语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相一致,即中文版本更强调集体利益和党的领导,而韩文版本更强调个人作用和领导人的影响。

维度2反映了两种语言在时空概念使用上的相似性。在维度2上,中文版本和韩文版本的高频词分布比较接近,都在原点附近呈现出一定的聚集。具体来看,表征时间概念的“过去”“现在”“未来”等词和表征空间概念的“中国”“国家”“世界”等,在两个版本中都位于维度2的中心区域。这表明,尽管中韩政治话语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但在强调时空考量、立足本国国情等基本话语策略上却有着共通之处。

维度3反映了两种语言在语域和体裁特征

上的差异。在维度3上,中文版本的高频词呈现出明显的聚类,而韩文版本则较为分散。这可能是由于中文原文是一个体裁和语域高度一致的政治文本,而韩文版本在语域和体裁上有所变异。作为外宣文本,韩文版本可能会根据不同的语境和受众,采取不同的语体风格和表达方式,这导致其在维度3上的分布较为离散。

总之,通过MDS分析,我们直观地呈现了中韩文版本在语义空间上的异同。一方面,两个版本在时空概念的使用上体现了一定的共性,反映了中韩两国在基本政治话语策略上的相似性;另一方面,两个版本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和语域风格上则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折射出中韩两国在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化方面的分歧。这些发现与我们在高频词分析中得

出的结论相互印证,共同勾勒出中韩政治话语的语言文化图景。

### 3. 对应分析

对应分析是一种用于分析变量间关系的统计方法,它通过对列联表进行拆解,将多维数据降维到二维平面上,以揭示不同变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和内在结构<sup>[10]</sup>。对应分析在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中有广泛应用,特别适用于考察词汇在不同文本或语料库中的分布模式和语义联系。本文利用对应分析方法,考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韩文版本的高频词在语义空间上的分布情况,分析两个版本在词汇搭配和语义连接上的异同,并探讨其反映的思维方式差异。本文使用 KH coder 软件对高频词的词频矩阵进行对应分析,得到图 3 和图 4 的对应分析图。

通过对比两个版本的对应分析图,发现中韩文版本在词汇分布上呈现出一些异同。

首先,坐标位置不同,中文为右上,韩文为左上。在对应分析图中,右上方区域通常反映了文本中语义联系更加紧密的词语和话题,而左上方区域则往往代表语义联系较为松散的词语<sup>[18]</sup>。从图中可以看出,中文原文的高频词大多分布在右上方区域,表明中文原文在语义上更加凝练和严密,词语之间组合紧密,话题集中。这体现了中文政治语篇词汇使用的一般特点,即用词精练、结构严谨、中心突出<sup>[19]</sup>。相比之下,韩文译文的高频词则主要分布在左上方区域,说明韩文译文的语义网络相对较为松散,词语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话题也比较分散。这可能与翻译语篇的特点有关,译者在处理原文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目的语言文化和表达习惯的影响,导致译文在语义结构上与原文产生一定的偏离。

其次,词语搭配模式不同。进一步分析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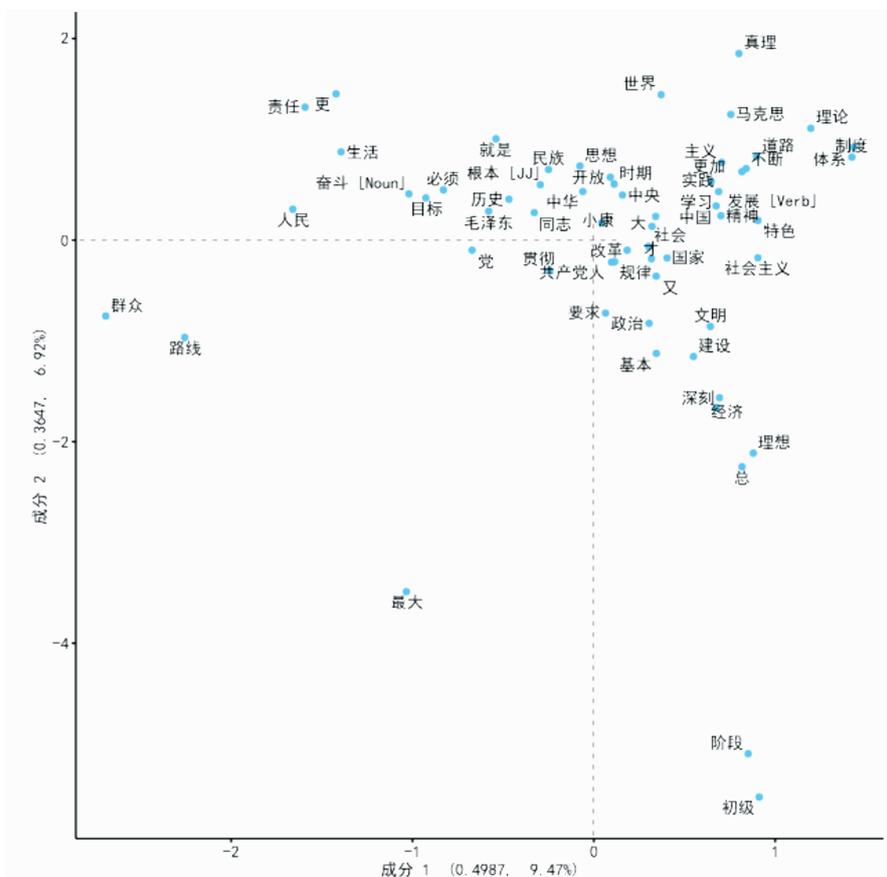


图 3 中文源文本对应分析数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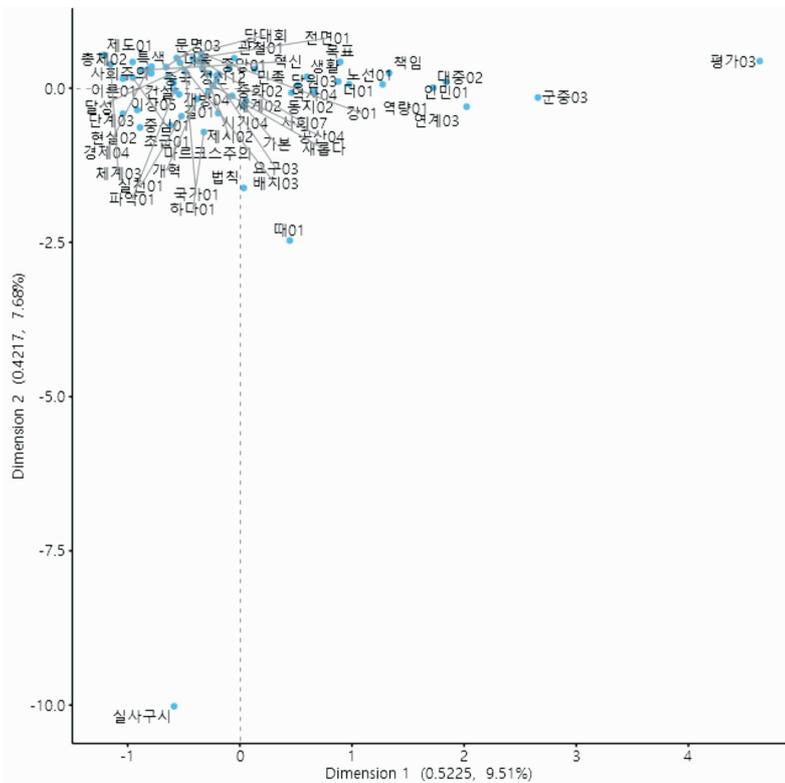


图4 韩文译文本对应分析数据图

现,中韩文版本的高频词在具体搭配模式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比如,在中文原文中,“人民”和“群众”两个词经常搭配使用,如“人民群众”等,反映了中国政治话语重视群众路线、强调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特点。而在韩文译文中,这两个词的搭配使用则相对较少。再如,“必须”在中文原文中属于高频词,常与其他词语搭配,用以表达强制性义务,如“必须坚持”“必须遵循”等。但在韩文译文中,表达同样语义的词汇如“一定”“必须”等的使用频率则明显偏低。这些词语搭配上的差异,反映了中韩两种语言在语义网络构建方面的差异。中文政治话语更倾向于用词表达的强烈感和义务性,以体现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和承诺;而韩文译文在语气上则相对委婉温和。这种语义风格上的差异,可能源于中韩两国在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和语言表达习惯上的分歧和差异。

再次,时空概念的聚集性分布呈现共性。

尽管总体上词语分布存在差异,但通过对应分析,我们也发现中韩文版本在某些语义区域呈现出共性。比如,从图中可以看出,表征时间概念的“当代”“现在”“今天”等词语,以及表征空间概念的“中国”“国家”等词语,在中韩文版本的对应分析图上都呈现出聚集性分布,说明两个版本都比较重视时空背景的交代。这反映了中韩两国在政治话语中对时空坐标把握的一致性。无论是汉语还是韩语,准确表述政策的时间性和针对性,向受众讲清楚政策制定的背景和现实意义,都是政治语篇必备的话语策略<sup>[20]</sup>。这种时空概念使用上的聚集性分布,从语义网络的角度证实了中韩两国政治话语存在一定的共性。

总之,通过对应分析,本文直观地展示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韩文版本在词汇分布和语义联系上的差异与共性。一方面,两个版本的高频词在空间分布和搭配模式上存在明显

差异,反映了中韩政治话语在语义风格和表达习惯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两个版本在时空概念的使用上又表现出一定的聚集性,体现了中韩政治话语在话语策略上的共性。

### 三、结论

上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对中国政治话语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及其效果进行了深入考察,针对三个核心问题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中韩翻译策略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韩文译本采取了灵活多样的翻译策略,如词汇选择、句法重构、增译补释等,力图在忠实原文内容的同时,适应目的语读者的接受习惯。这些翻译策略一方面有助于准确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拉近译文与目标读者之间的文化距离,从而提升政治话语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同时,通过研究也发现,在处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词汇时,译者采取了一定的“文化过滤”策略,淡化或回避了一些在目的语语境下可能引发误读或敏感联想的表达。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文的意识形态内涵,也避免了不必要的文化冲突,有利于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和传播。

其二,文化差异对翻译过程和目标受众的影响。通过高频词分析、对应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本研究深入考察了中韩两国在政治话语方面的文化差异,发现这些差异深刻影响着翻译的过程和结果。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语言表达方式、时空观念等方面,中韩两国存在明显分歧。这些分歧使得译者在翻译时经常面临两难困境:要么忠实原文、与目标文化期待产生偏离,要么迎合目标文化、背离原文内涵。译者只有在深入理解两种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在二者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同时,文化差异也影响着目标受众对译文的解读和反应。如果缺

乏原文文化语境的背景知识,目标读者对译文中某些词汇和表达的理解可能与原文作者的意图存在偏差,进而影响传播效果。因此,在政治话语的跨文化传播中,应高度重视文化差异的影响,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和传播方式,以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

其三,中韩翻译对比分析揭示了跨文化传播的深层机制。通过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韩文版本的系统对比分析,本研究揭示了政治话语跨文化传播的一些深层机制和规律。首先,政治话语的跨文化传播是一个复杂的再语境化过程,既受到语言文本因素的制约,也深受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其次,在跨文化传播中,原文话语内容和形式都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和调适,但其蕴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往往更加隐蔽和难以捉摸,需要结合语言分析和文化解读方法加以揭示。再次,尽管政治话语内容的传播会受到文化差异的掣肘,但人类在基本价值理念上的共通性,如对和平、发展、合作、正义的向往,又为跨文化政治话语的理解与沟通提供了基础。因此,增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在核心价值观方面的认同,是实现政治话语有效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最后,跨文化政治传播应坚持求同存异的基本原则,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同时,努力挖掘人类共同利益所在,在平等对话中增进政治互信,消除分歧,这既是跨文化传播应遵循的伦理原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需要。

有效的政治话语跨文化传播离不开精准的语言表达、灵活的翻译策略、多元的传播方式。在今后的实践中,应进一步加大对外翻译出版力度,建设高素质的翻译人才队伍,创新话语表达和传播方式,努力塑造更具国际亲和力的中国话语体系。

#### 参考文献:

[1] 任文,李娟娟. 国家翻译能力研究:概念、要素、

- 意义[J]. 中国翻译, 2021, 42(4): 5-14, 191.
- [2] 祝朝伟.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典故的英译方法及对外宣翻译的启示[J]. 外国语文, 2020, 36(3): 83-90.
- [3] 赵子鑫, 胡伟华. 翻译语体语法标记显化的语料库研究: 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官方英译本为例[J]. 西部学刊, 2021(7): 157-160.
- [4] 朱义华. 外宣翻译的新时代、新话语与新思路: 黄友义先生访谈录[J]. 中国翻译, 2019, 40(1): 117-122.
- [5] 王晓荣. “一带一路”视域下主题出版走出去路径探究[J]. 中国出版, 2019(5): 54-57.
- [6] 何明星. 从“阐释中国”到“中国阐释”: 中国主题图书“走出去”70年回顾与展望[J]. 人民论坛, 2019(25): 128-131.
- [7] 朱伊革.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与中国形象在海外的传播[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8, 26(2): 89-93.
- [8] 闫如武. 翻译的语料库研究范式评析[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 25(3): 94-98, 128.
- [9] PAQUOT M, BESTGEN Y. Distinctive words in academic writing: A comparison of three statistical tests for keyword extraction [M]. Corpora: 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2009.
- [10] D'AMBRA L, AMENTA P, D'AMBRA A.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methods for contingency tables with ordinal variables[C]//PERNA C, PRATESI M, RUIZ-GAZEN A. Convegno Della Società Italiana di Statistica. Cham: Springer, 2018: 145-156.
- [11] 陈富国. 多维标度法的理论与方法[J]. 心理科学, 1990(4): 38-42.
- [12] BESTGEN Y. Inadequacy of the chi-squared test to examine vocabulary differences between corpora[J]. Lit Linguistic Comput, 2014(29): 164-170.
- [13] BESTGEN Y. Getting rid of the Chi-square and Log-likelihood tests for analysing vocabulary differences between corpora [J]. Quaderens DE Filologia-estudis Linguistics, 2017(22): 33-56.
- [14] BASSNETT S. Translation studie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2: 98.
- [15] BASSNETT S, LEFEVERE A.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M]. London: Printer Publishers, 1990: 62.
- [16] SHAN Q. A cognitive typology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and Korean political metaphors: Taking the Korean translation of keywords to understand China as an example [J]. Asia Cultural Creativity Institute, 2023: 259912780.
- [17] RHODE A, VOYER B, GLEIBS I. Does language matter? Exploring Chinese-Korean differences in holistic perception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6(7): 10. 3389.
- [18] HOFFMAN D, FRANKE G.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of categorical data in marketing research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6, 23(3): 213-227.
- [19] 刘静怡. 政治文本的词汇特点及其翻译方法 [D]. 上海: 华东政法大学, 2017.
- [20] RUE Y, ZHANG G. Request strategies: A comparative study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Korean [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责任编辑: 侯圣伟]



引用格式: 姜坤. 基于数据驱动的政治话语翻译研究: 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本为例[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5(4): 87-96.